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常林瑞

张金涛

纂辑

中国历代文书



中国城市出版社

中国历代文选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纂辑
常林瑞 张金涛

中国城市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代文书/常林瑞, 张金涛纂辑. -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6.8

ISBN 7-5074-0845-0

I. 中… II. ①常… ②张… III. 文书-中国-古代
IV. K2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4409 号

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和平西街 21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35833 传真: 64214573

责任编辑: 李 青 责任印制: 刘宪林

封面设计: 李 峰

北京市友谊印刷经营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数: 244.6 千字 印数: 4000—8000 册

定价: 16.00 元

前 言

中国古代文书的产生,始于文字记事,中国的文字用于记事,是伴随着文字的出现就开始了。从现存的材料看,最早的记事文字是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它们都是原始的文书。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尚书》,已是一部古代文书的汇编了。

文书作为实用文体,在诸多文体中形成得最早。但是自秦汉以后却少有文书汇编印行,以文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也没有发展起来。南朝时著名文论家刘勰就曾注意到这种现象,他在《文心雕龙·章表》中指出:“按《七略》、《艺文》,谣咏必录。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阙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职司也。前汉表谢,遗篇寡存。”

刘勰所说的《七略》,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二人典校古籍时编制的目录,为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书中除《辑略》概述古籍的整理过程外,还按类别把图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求数略》、《方技略》六大类。《七略》对歌谣、医方一类的书籍都“条其篇目,撮其指意”,但唯独对章表奏议这类文章未以专略收录。

东汉班固在《七略》基础上写成《汉书·艺文志》,除把藏书分为六大类外,又进一步细分为 38 种,596 家,但仍旧没有把章表奏议列入其中,而只在《六艺略》的《书》家卷中附列奏议 42 篇。

《七略》和《艺文志》对图书的分类,反映了汉代学者对文体的基本认识,其中章表奏议阙而不纂的原因,决不是由于疏漏,而是正如刘勰所说,这类文章是“经国之枢机”,与国家政务有直接关

系,往往在一定时间内带有秘密性,这种工作始终由专门机构的专职人员负责,具体方法多是相沿成习,有较浓厚的行业特点与封闭性,“乃各有故事而在司职也”,因而难以公开与普及,限制了人们对它的了解与研究。

由于上述原因,尽管研究者始终并未忽视文书这一领域,但很长时间内,文书一直难以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

例如在文论方面,刘勰所著《文心雕龙》共 50 篇,有 21 篇专讲文体,而其中 12 篇讲的都是文书,并且对每种文书体式的由来沿革、作用特点等等,都有全面精辟的论述。但是对于这部文章学专著,历来主要注重它在文学创作与批评方面的成就,而忽略了它在文书学研究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此外如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等,都有类似的情况。

在文选方面,从南朝梁太子萧统编辑《文选》开始,各体文书尽管始终为历代选家所重视,却一直与文学散文混同在一起。大约直到宋代才有了文书专辑问世。此后有人相继编辑了《两汉诏令》、《唐大诏令集》、《宋大诏令集》、《明经世文编》、《皇朝经世文编》、以及《历代名臣奏议》等。不过这类文体或已年深月久、古奥难读,或是分朝断代、未见全豹,尤其是大多只注重公文而没有概全,至于事务文书则多散辑在其他类文选中,与今天对文书的认识相去甚远。

近年来,文秘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各界对文秘人才的需求成为热门,许多大中专院校纷纷增设文秘专业。然而目前对文秘人才的培养多集中在现代文秘知识与实用技能等方面,这固然可以应一时之需,但从提高素质、打好基础、着眼长远的角度来看,尚有欠缺。

作为现代文秘工作者,应该具备多方面的专业技能与文化修养,不但需要熟练掌握各项实际工作方法,而且还要有雄厚的基础素质为后援。其中文书写作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项内容,在文秘工

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若想具有较高的文书写作能力,不但需要了解现代文书的特点及写作常识,而且应该了解现代文书与古代文书的异同,及其沿革演变过程,特别是把文书写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一个特殊职业来审视的时候,就不可能不注意到它与传统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无法与历史沿习断然分离,只有对其历史渊源有一定了解,才可能更好地把握现代文书的特点,自如地去驾驭它。

有鉴于此,我们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文秘系在建系之初,就力图摆正基础与实用的关系,在重视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同时,开始着手在较广阔的范围里加强基础文化教育,在优先保证专业课程教学的同时,陆续增设历史、文化、经济等一系列基础课程,并于1988年开始讲授《中国历代文书》。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证明,这种考虑是有积极意义的,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本书就是在这样的教育思想指导下编写而成的一本教材。

《中国历代文书》意在勾勒中国古代文书发展的大致脉络与轮廓,主要总结主宰中国两千年古代历史的封建王朝的文书的基本特点。这个时期的文书是中国古代文书的主体,也是现代文书的前身。正由于现代文书仍然具有古代文书的许多基本属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因此了解古代文书的特点,探索其发展变化规律及对现代文书的影响,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封建王朝文书始于秦代,先秦时期是其发端与酝酿阶段,故由先秦文书起笔,以示其形成与变迁的渊源。封建王朝止于辛亥革命,其文书亦与之相始终。此间大致分为秦汉、三国六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阶段,依次介绍各个时期的文书特点。这种划分阶段的方法,主要出于对文书特性及沿革情形的理解。以历史的观点看中国封建王朝的更迭,主要以实际主宰广大汉族居住区的王朝为序,其间某些较为短暂的战乱割据时期则没有概括在内,

例如唐宋之间的五代。两宋时期依朝代而言,仍合而称为宋代,这样比较符合具有鲜明朝代特点的文书的实际。至于两晋与南朝合称六朝,只是出于一种称呼习惯,并没有把晋分为两朝的意思。有关划分阶段的详细思考,可参看各阶段概述。

有关文书的范畴,历来说法不一。最早有关文书的概念,大概要算“书契”了。《周易·系辞下》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在这段记载中,“书契”已具有文书的意义。后来也称文书为“文牒”、“案牒”、“公牒”等等,虽然例如“公牒”专指公文,但多数情况下都是把公务文书与私人文书合在一起泛称的。本书着眼于文书的广义概念,将文书分为帝王文书(附官府下行公文)、上行公文、平行公文和一般文书四类,既为了将公文与一般文书相区别,又为了突出帝王文书的特殊属性。后者应该是封建王朝文书有别于其他时代文书的显著标志之一。

本书原为我院文秘系专业基础课教材,出于教学的需要,在分阶段概述文书情况之后,分别附有若干篇文书名篇,文书首选篇幅短小之作,各依作者时间先后为序,尽量选收不同文体。为便于自学阅读,每篇文书均冠以简要说明,介绍写作背景,提示文书主旨,说明文体特点;正文之后所附注释,采取直解形式,不求引经据典、征引出处,只为易于理解、说明问题,以适合一般读者的阅读需要。

书后附录了《中国古代秘书职官》和《中国古代文书文体》的部分名词解释,既作为资料,也可供阅读参考。名词释文采自《辞海》及陈文清先生主编的《文秘词典》,特此深致谢忱。

中国古代文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只堪望其项背,未敢妄言涉足。虽纂辑成帙,不免贻笑于大方。编者用心拳拳,希望于读者有益;缺点错误之处,敬请多所指正。

编 者

1996年5月15日

目 录

前言

先秦文书

概述	(3)
《尚书》 牧誓	(11)
无逸	(13)
《左传》 晋楚“宋之盟”盟文	(16)
子产告范宣子轻币	(17)

秦汉文书

概述	(21)
李 斯 谏逐客书	(29)
请焚书议	(33)
嬴 政 初并天下议帝号令	(34)
除谥法制	(35)
刘 邦 入关告谕	(36)
刘 启 令二千石修职诏	(37)
刘 彻 求茂才异等诏	(39)
刘 秀 赐宴融玺书	(40)
邹 阳 狱中上梁王书	(42)
晁 错 论贵粟疏	(49)

司马相如 谕巴蜀檄 (53)

马援 戒兄子严敦书 (56)

三国六朝文书

概述 (61)

陈琳 为袁绍檄豫州 (69)

曹操 举贤勿拘品行令 (76)

军令 (77)

曹植 求通亲亲表 (79)

诸葛亮 劝将士勤攻己阙教 (84)

祢衡 吊张衡文 (85)

李密 陈情表 (86)

颜延之 陶征士诔 (89)

傅亮 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 (95)

丘迟 与陈伯之书 (97)

刘琨 劝进表 (101)

鲍照 请假启 (106)

隋唐文书

概述 (111)

李谔 请革文华疏 (119)

李世民 问魏征病手诏 (122)

魏征 谏太宗十思疏 (123)

骆宾王 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126)

张说 为河内郡王武懿宗平

冀州贼契丹等露布 (130)

韩愈 柳子厚墓志铭 (136)

柳宗元 驳复仇议 (141)

陆 贄	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144)
白居易	与元微之书	(150)
刘禹锡	陋室铭	(153)

宋代文书

概述	(157)
欧阳修 泂岗阡表	(166)
王安石 乞制置三司条例	(170)
司马光 进《资治通鉴》表	(173)
苏 軾 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	(176)
乞校正陆贄奏议进御札子	(179)
苏 辙 上枢密韩太尉书	(183)
宗 泽 乞毋割地与金人疏	(185)
岳 飞 南京上高宗书略	(188)
胡 铨 戊午上高宗封事	(190)
辛弃疾 跋绍兴辛巳亲征诏草	(195)
陆 游 戊申严州劝农文	(196)

元明清文书

概述	(201)
阎 复 加封孔子制	(214)
朱元璋 正礼仪风俗诏	(215)
方孝孺 杂戒五章	(216)
戚继光 筑台规则	(218)
海 瑞 禁馈送告示	(220)
杨继盛 弹严嵩疏	(221)
张居正 岁赋出入疏	(226)
汤显祖 牡丹亭记题词	(229)

夏完淳	狱中上母书	(231)
玄 烨	康熙遗诏	(235)
曹 寅	奏谢钦点巡盐并请陞见折	(238)
弘 历	刻三希堂法帖特谕	(240)
魏 琯	甘肃巡按揭帖	(242)
方 苞	论考试翰林札子	(243)
林则徐	传牌一件	(246)
郑 燮	判词一则	(247)
曾国藩	字谕纪鸿儿	(249)
龚自珍	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250)

附 录

古代文书文体名词解释	(257)
古代秘书职官名词解释	(282)

先秦文書

概 述

中国古代文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及其后的铜器铭文是最早的文书,到了《尚书》则已是古代文书的总集了。

中国古代文书的产生,始于文字记事。现今发现的具备比较完整的体系的古代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它大约形成于公元前14至11世纪,是殷商后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也称为甲骨卜辞。

殷人尚鬼,每事必卜。这时的记事文字,主要是记录卜辞。卜辞的内容虽然以占卜为主,所反映的事物受到一定限制,但也包含了祭祀、征伐、田猎、农业、畜牧、地理方国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卜辞既记录了占卜活动,也是国家大事的记载。卜辞一般都很简短,现存最长的卜辞也不过百余字。一条完整的甲骨卜辞通常包括叙辞、命辞、占辞和验辞四个部分,还有署名和日期,形成了基本的文体样式。此外,占卜的程序和文字的刻写等都有固定的要求。甲骨卜辞从内容到形式都具备了文书的一般特点,可以看成是现今已知的最古老的文书。

文字的产生是由于记事的需要,现今发现的甲骨文都可归入文书的范畴。文字是构成文书的基础条件之一,文书也有赖于文字这一载体。因此无论从文字的功用还是从最早的文字材料来看,似乎都可以说,文字是因文书的需要而伴随文书同时出现的。人们因为需要书写文书而创造了文字。因文字的出现而使文书得以形成。

从现存的文献材料看,这些卜辞的作者是殷商时期的卜官。

他们身兼神职与史职，既掌管祭祀与占卜，又负责记录国家大事与君主言行。当时这两种工作没有明确的分工，主要因为它们都需要由掌握着文化知识的人员来承担。上古时期的知识传授主要依靠家学方式，世代相传，因此形成了最早的知识分子阶层，即古代的卜官。卜官均为世袭。后来知识分子逐渐增多，社会分工日趋细致，巫史才形成各自独立的系统。

古代占卜活动繁多，积累下大量卜辞。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专为巫卜所用的卜筮著作，《周易》就是其中之一。

《周易》又称《易经》，全书可分成卦象、卦名、卦辞、爻辞四个部分。卦象即卦的标记符号，共64卦；卦名是每卦的名称；卦辞解释全卦的含义；每卦由六爻组成，爻辞即解释每爻的意义。

关于《周易》的作者，有种种传说。旧说《周易》最基本的符号“八卦”始作于伏羲，周文王演《易》，重为六十四卦；又说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现在多认为《周易》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可能是西周末年的卜官根据旧卜辞编纂而成。这是先秦古籍成书的普遍现象。

《周易》将前人零散简略的卜辞进行选择编排和加工，组织成有中心有层次的卦爻辞，已不只是一般的卜筮记录，不再是简单的日常记事，而成为有思想内涵的精炼文辞，反映了先秦文章从片断的简短语录形式向有篇章组织的完整记叙形式的演进过程。它在思想内容方面对后世的哲学产生深远影响，它的叙事方法和语言风格也在散文的发展中得到借鉴和继承。但是在文体方面，由于从最初的甲骨卜辞直至其后的解说性文字《易传》，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因此文体始终没有突破卦爻辞的基本范框而有所发展，对后世文体的演进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易》卦爻辞流传到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许多解说性文字，称为《易传》，现存7种10篇，统称“十翼”，旧说是孔子辅《易》之作。宋代欧阳修对此说首先提出疑问，近代学者多认为《易传》可能导

源于孔子,而由战国、秦汉间的一些不知名的学者写成。《易传》10篇的写法并不一致,表达方式也有所不同,说明各篇作者并非一人,成书也不是出于一时。《易传》已经不是卜辞、卦爻辞那样简短的片断文辞,而是具有严密推理和完整结构的篇章组织了。虽然每篇还没有自成一个主题,但其中每个段落已能独立成章,有条有理,反映出明确的思想观念,充满说理的意味。这种特点是先秦文章向说理文方面发展的明显表现。

随着记史与卜筮活动的逐渐分立,开始出现专职的史官。史官记事之文是中国古代文书的又一个源头,对文书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传说黄帝时已有史官,《世本》记载:“黄帝之世,始立史官,苍颉、沮诵居其职。”今人认为黄帝时代有记事之史恐不足据,但到了殷商时代,设有史官,则较为可信。由于史官记事,就有了许多典册。《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所谓册典,就是史籍。这个时期的记事文字大致有两类,一类是铜器铭文,一类是虞夏商周之书。

古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又称金文。因为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多为钟鼎彝器,故又称为钟鼎文。据现代研究,青铜器上有铭文始于商代的二里冈期,以后逐渐增多,至西周而大盛。金文一般专指先秦时期的铜器铭文。后来的青铜器物有的仍有文字,但已不在金文范畴之内。

初期的铜器铭文,文字都很简短,西周以后出现长篇铭文,如周康王时的小孟鼎,字数已多达四百余字。铭文主要是关于祀典、锡命、征伐、契约等方面的记事,是关于史事的记载,前人多说有些铭文的价值抵得上一篇《尚书》。西周中期以后,铭文格式逐渐固定化,有些已是册命类铭文,秦代铭文还出现了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这些铜器铭文也属于早期的记事文书,其记事形式与所记内容对后世碑铭文有一定影响。

虞夏商周之书,如今主要指《尚书》而言。据《左传》等书记载,

《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史书,但均已失传。《尚书》是一部上古历史文献汇编,所录都是虞夏商周各代君王的讲话记录,有誓词、政府文告、君王的告诫之词等。其中虞夏的文献是后人据传闻写成,多为战国时期的拟古之作,不尽可靠。商周之书比较可信,但也经后人增损。《左传》等书引《尚书》文字时,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即“上古帝王之书”的意思。《尚书》后来一直被视为社会政治哲学的经典,成为帝王的教科书。

古人认为《尚书》曾经孔子编次,《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认为《尚书》可能是历代史家的著述,早已在世上流传,孔子加以编次也是可能的,而最后编定的时间大约在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尚书》也在被焚之列,遂亡佚。汉初搜集得 29 篇,为秦朝博士伏生所传,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汉武帝时,相传鲁恭王拆毁孔子故宅,发现用古文字写的一部《尚书》,比《今文尚书》多 16 篇,所以称《古文尚书》,后来亡佚。东晋元帝时,梅颐献伪《古文尚书》,这部书比《今文尚书》多 25 篇,并从《今文尚书》里分出 5 篇,而《今文尚书》里的《秦誓》已佚,所以合计 58 篇。这个本子后来成为通行本之一,流传了一千多年。宋人始怀疑其真伪,直到清代才揭穿晋人作伪的事实。

《尚书》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文书种类,主要有典、谟、训、诰、誓、命六种。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记君臣谋略,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这六种文体各有明确的使用范围和特点,是古代文书分类的开端,有的文体后世一直沿用,有的在演变过程中发生很大变化。《尚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公文总集,对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公文,如制诰、诏令、章奏等,都产生明显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的演变情况时,也都把《尚书》看作发展的源头。